

馬相伯先生與聖經

方 豪

——六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聖經學講座演講——

一、(前言)最忙的人也能抽暇研讀聖經

第一次聖經學講座，請吳德生(經熊)先生講「蔣總統與聖經」。這題目好極了。它之所以好，並不因聖經學講座，就是為紀念總統蔣公而設立；也並不是因為他是委員長、是主席、是總統，所以以此為題。天下皇帝、總統比比皆是，並沒有人講裕仁天皇與聖經，也沒有人講甘納迪與聖經，或福特與聖經。在歷史上，身為一國元首而熱愛聖經的，或者並非沒有人，我沒有為此事做過考證，但是像總統蔣公這樣繁忙的人，而仍能每日研讀聖經，重視翻譯聖經，並且親自校閱，親自用紅、藍、黑筆圈點批改譯稿，我可以大膽的說：中外古今是找不到第二人的。

他邀請吳德生先生翻譯「聖詠」即「詩篇」，翻譯「新經」即「新約」，我當時也在重慶，承蒙吳德生先生不棄，常不恥下問，當時的情況我知道得清楚，譯稿我都看過兩次或三四次：一次是呈送委員長之先，一次是委員長批閱修改，或提供意見，交回來以後；如有第二次、第三次交回，我也多看一看兩次的機會。

試想當時中國戰場遠比歐洲或太平洋為遼闊：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廣東、廣西、浙江、江西

、山西、陝西、雲南西部，最危急的時候，敵軍且已侵入貴州獨山；還有江蘇、浙江、安徽、河北、山東等淪陷區的敵後部隊，他都要計畫，都要指揮；軍事之外，外交、財政、教育、經濟，無一不需要他指導。即躋身四強之後，像英國在緬甸，還在扯我們的後腿；美國的外交官員中，已有不少親共分子；法幣已在貶值，物價也在劇烈波動，軍糧、軍火尤迫不及待的需要補充；而

大學教授與學生中，也有不穩定的現象，然而當時的蔣委員長或後來的蔣主席，對於聖經，却視同日課，隨身攜帶，看他讀後所記，必有年月日，第一次用紅色鉛筆，第二次用藍筆，有時選用橡皮擦了再改；到了不能再改時，便用毛筆再改，有幾次註明是在防空洞內。三十三年十一月三日，重慶已謠傳貴陽失守，吳先生從委員長侍從室陳布雷先生處取回聖經譯稿五六冊，要求我連夜同他一起斟酌。我身上帶有貴州殉教真福的聖髑，(教會對於有懿行足資典範者，先宣布其為真福；俟有奇蹟，方封其為聖人。聖髑乃極小塊遺骸。)吳先生提議：貴陽吃緊，貴州教會先烈，理應保境安民。我們便一同跪下祈禱。次日消息，日軍竟從獨山撤退；但是我却在兩浮支路口被汽車撞傷，從人力車上翻下，額上流血。吳

先生到醫院來看我，說是：「貴州安全，豈能全無代價？非有人流血不可。」我聽了大為欣慰，並自以為榮。

我說這一段往事，是證明一位全世界最繁忙的統帥，在戰事最吃緊的時候，仍能不忘譯經，這是何等的虔誠！非篤信的信徒，豈能如此鎮定？許多人，甚至自稱是虔誠的教友，却不研讀聖經，而他們唯一推託的理由是「忙」，是沒有時間。請問當年蔣委員長不但是在百忙之中，而是千忙、萬忙，我國古人稱君主是「日理萬機」，但是你們中，我們中，那位比得上蔣公？所以我說第一次聖經學講座題目取得最好，是告訴我們任何人必能抽得出時間來讀聖經。而今天我所要講的是最老的人也能研讀甚至翻譯聖經。

二、「新史合編直講」的譯撰

今天我舉出一位最老的人，一位百歲老人，談談他對於聖經的尊敬、重視，並且一譯再譯，但不幸竟不能目觀譯本的出版，歎恨而終。他就是馬相伯先生。

他比我整整大七十歲，所以今天他如在世，應該已是一百三十六歲。當人家問我歲數時，我總喜歡說：「比中華民國大兩歲」。馬先生却比

中華民國大七十二歲。比國父孫中山先生大二十六歲。

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廿一日我到了桂林，逗留十日，我曾去拜訪他；那年我二十九歲，他九十九歲。他約我到他的寓所去舉行彌撒，彌撒後共進早餐，他聽說我要到昆明去協助于斌主教辦益世報，他囑咐我打聽他所翻譯的「救世福音」原稿的下落。據說他是在南京親自交給于主教的，他希望能親眼看到出版。他連版式都告訴了我：他指明要線裝，要大型，字體要大，他纔能看等等。

他曾於同治元年（一八六二）入耶穌會，九年（一八七〇）晉司鐸。光緒二年（一八七六）因所著「度數大全」不獲刊行，退出耶穌會。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）重返教會。他開始翻譯聖經是六十二歲（光緒二十七年，一九〇一）。也就是義和團起事後一年。六年前，他在青浦附近余山聖母堂作了為期一年的退省（即過去所稱「避靜」），為他講道的是沈則寬神父。實際等於是受懲罰，教會所謂作補贖。（六十二年七月「天主教學術研究所學報」第六期拙著「馬相伯先生年譜新編」作沈錦標神父，誤。當年江蘇金山縣南高橋沈家出了兄弟三位神父：第一位沈則恭字禮門，比馬先生大三歲；第二位沈則寬字容齋，通稱沈三神父，比先生大一歲；第三位沈則信字有孚，比先生小一歲，都進了耶穌會。第四、第五位沈則良、沈則儉，都不是神職。他們五人是否親兄弟？抑或是堂兄弟，現在已無法查證。至於我寫錯的沈錦標，字宰熙，也是耶穌會神父，是周莊人，和南高橋沈家，根本不是一族，比相伯先生小五歲。）而這位沈則寬神父就是「古史

參箴」的作者。「古史」即「舊約」歷史部分；「參箴」是雜以箴諷。

一九〇一年，在中國天主教會史上是很重要的，不但因為這一年馬先生開始翻譯他的「新史合編直講」，而且也是這一年雷鳴遠神父到中國來，英敏之先生在天津籌辦大公報。

這本聖經原書是法文 *Les Evangelis mis, traduits et commentés*，作者是 *Mastai Perretti*，將拉丁原文四福音，加以合編；在每一本福音中，只採取這本福音所獨有的記載，凡他認為和其他福音重複的，他即不用。這個作法，當然使人看「一本書，等於看了四福音。但當時聖經學不如今日發達，*Perretti*認為是重複的，不一定是重複；而他認為不重複的，也許真是重複。

這部譯本，正文用文言翻譯，非常古雅，但「直講」用白話，可以說開啓了白話文運動的先聲。

我想馬先生一定是受了為他講一年退省的沈則寬神父的影響，沈神父的「古史參箴」是用章回小說體翻譯了舊約的歷史部分，所以馬先生再繼而翻譯新約，他稱之為「新史」。

在此三年前，「馬氏文通」自印本刊行。「馬氏文通」是第一部依照西洋文法講中國文法的書，用他兄弟建忠字肩叔的名義發表。據相伯先生自己說，實在是他們兄弟二人合作的。為了獎勵兄弟，所以只署兄弟的名。

根據這本書的序：「愚故罔揣固陋，取四書、三傳、史、漢、韓文為歷代文詞升降之宗，兼及諸子語策，為之字櫛句比，繁稱博引；比例而同之，觸類而長之，窮古今之簡篇，字裏行間，

渙然水釋，皆有以得其會通。」這篇序當然也只署「丹徒馬建忠」之名。但根據這本書的序言和例言，大約可以知道他們兩兄弟所熟讀、所愛好的是論語、孟子、大學、中庸、公羊傳、穀梁傳、左傳、國語、戰國策、莊子、史記、前漢書、後漢書、三國志、晉書、到韓愈為止。據例言說，有時也採用荀子、管子。所以「新史合編直講」的正文部分，用字是都有根據的，絕對正確的，非常切合原書拉丁文或法文原義的。「聖經辭典」只說這本書「譯文雅而達」，似乎不夠透澈。要窺探馬先生的聖經譯文，必須先研讀他們兄弟二人所著的「馬氏文通」。

三、「新史合編直講」的出版

這譯本到民國二年（一九一三），纔由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出版，離開他譯書已十二年了。「聖經辭典」說這本聖經是馬相伯先生在一九一三年翻譯，那是錯把出版之年作為他翻譯之年。我們不知道為什麼要擱置這麼久。是審查費時嗎？是因為他一度去從政，沒有時間校閱呢？我們不得而知。這印本版式很大，字體也很清晰，不但沒有序，而且也沒有署馬先生的名。這原因我在下文會加以研究。

我們來看看從「新史合編直講」翻譯前幾年到出版的十幾年之間，馬先生做了些什麼事？

譯經前五年即光緒二十二年（一八九六）梁啟超先生從先生兄弟學拉丁文。

民國三十五年，我在北平英敏之先生的老家找到了英先生的日記，在譯經前兩年，即光緒二十五年（一八九九）陰曆正月十四日，英先生記

說：「至土山灣，欲拜馬相伯司鐸，不便，候良久，遂出。」可見：

第一、當時英先生仍稱馬先生是司鐸。

第二、馬先生仍不便接見教友。

第三、英先生等了很久，仍見不到。

可見馬先生的譯經是出於一種認罪懺悔改過的心理去作，或許也是一種自我懲罰。

但是他在當時名望太大了，譯經後二年，即光緒二十九年，先生六十四歲，南洋公學教授蔡元培、胡敦復等率學生請先生教拉丁文，先生即請耶穌會准許他借徐家滙老天文臺創辦震旦學院，並請耶穌會協助。次年，于右任先生因作詩譏諷清廷，被陝西巡撫指為革命黨，奏請革去舉人；下旨：「無論行抵何處，拿獲即行正法。」于先生逃至上海，即投馬先生門下，改名劉學裕入震旦學院。

于先生以後一生對天主教及天主教人十男眼相看，都是爲了尊敬馬先生。

譯經後四年，因一位在安徽傳教的耶穌會外籍教士南從周，調至震旦學院；震旦學院有許多馬先生手訂的特殊規例，如學生自治制，各部事務都由學生自己管理。學生並實行軍訓等。這位南神父把這些規章完全改了，因此引起風潮，學生罷課。馬先生在此情形下，只好辭去自己一手創辦的震旦校長，而于右任等也率領學生到吳淞創辦復旦公學，仍推馬先生爲校長。

這年，美國國會通過限制華工法案（The Chinese Restriction Act），上海學會決議抵制美貨，馬先生時任會長；後又召開學商界大會。譯經後六年，梁啟超在東京成立政聞社，請先

生任總務員，等於今日的秘書長；在日本幾個大都市演說，轟動一時。當時許多人不贊成他和梁啟超合作。最近我在日本出版的「民報」第十九號找到了章太炎給他的信，開口便說：「居賢善俗，神道化民者，是先生之志也。……舍天爵而植朋黨，先生不其然。」可見當時社會上仍以宗教家期望他。信末章太炎先生說：「有皇上帝，愛民甚矣，豈使其新黨蒙民肆於人上？」

譯經後七年，政聞社被迫解散，馬相伯與梁啟超先生的政治關係即告終止。

譯經後十年即宣統三年（一九一一年），亦即辛亥革命之年。那時，先生和張季直先生主持江蘇省諮議局，所以當時兩人的言論，對政局真有舉足輕重之勢。武昌起義，漢陽失守，南京新軍第九鎮急謀響應，反革命的軍人要繳他們的槍械，但終能保全，馬先生是與有功的。當日能保全第九鎮新軍，就是保全革命元氣。

辛亥年九月十日即二十六日馬先生都在南京。在南京光復之前，馬先生僕僕於滬寧道上，與革命軍密切聯繫。江浙聯軍總司令部在鎮江成立後，設參謀部、外交部、交通部等八個部，馬先生任外交部部長。在南京光復出力人員，經國父孫大總統頒獎的三百二十一人中，亦有馬先生。中央黨史會有剪報可查。

十月十七日，江蘇都督府成立，設二廳、五司，馬先生任外務司司長：「管理外國交涉，及外人事務，並在外僑民事務，監督外交官。」

當時各省都有臨時都督，江蘇都督程德全在上海醫病，軍界推莊蘊寬爲代理都督，商民請駐省垣，馬先生又在南京代理，南京人亦稱之爲馬

都督。

在譯經後十一年，出版前一年，即民國元年，先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當臨時大總統，後參議院選袁世凱爲第二任臨時大總統；袁世凱不願南下，派黃興爲南京留守，任馬先生爲政務處處長。不久，袁世凱聘先生爲總統府高等政治顧問。

先生到北平後，他身在政界，心在教會，最關心的是教會的教育問題，所以九月二十日，他和英敏之先生聯名「上教宗求爲中國興學書」，主張在華北例如北京創辦一所天主教大學。因當時教會文風低落，無人能競選國會議員、府縣議員；而基督教已有大學若干所，天主教只在上海有一震旦大學而已。

十月十八日，袁世凱又任命先生爲代理北京大學校長，時間甚短，只兩個多月。

民國二年，先生已七十四歲，六月，憲法起草委員會成立，先生又任爲委員之一。

這是馬先生一生政治生活最輝煌的時期；民國三年又當參政院參政；而「新史合編直講」就在這樣一個局面之下出版。爲什麼譯者不署名呢？根據馬先生在四年前即光緒三十四年，爲李問漁神父編的「墨井集」所作序，大約是馬先生自己不願意。清初康熙年間，教會中產生了一位名畫家吳歷，字漁山，號墨井道人，爲清初六大名畫家「四王吳惲」之一，常熟人，妻死後，曾到澳門修道，讀拉丁文及神學，本擬前往歐洲，未果，康熙二十七年（一六八八）晉司鐸，已五十七歲。馬先生在序內有幾句話說得很好：「人以天學而可重，非天學以人而重。詩、畫、琴、書之在墨井也亦然；非墨井因之而重，惟墨井能以

天學而自重，而詩、畫、琴、書，遂因之特重。馬先生的話意味深長，他不贊成教會動輒以徐光啓、李之藻、楊廷筠等明末朝士來標榜，他認為他們之可貴，乃在他們信了教，接受了福音，做了上帝的兒女；上帝和教會並不因他們而提高身價。所以他不願清末民初的教會以吳漁山神父為標榜，亦不願別人以他自己為標榜。我們也可以改他的話來說：「馬相伯以天學而可重，非天學以馬相伯而重」。我們的教會，並不以某一皇帝、某一總統信教而提高地位，總統 蔣公自有他在俗世的豐功偉業，值得我們歌頌，但他成了耶穌基督的信徒，尤其因他知道重視聖經，他的勳績因而更有價值。

四、演講「聖經與人羣之關係」

民國初年，先生在北京，一般社會人士只知他忙於國事，但他最熱心的是教會中事。他協助英斂之先生整理教會舊籍，在香山靜宜園辦輔仁社；後來擔任輔仁大學副校長、校長的陳援菴先生（垣），研究元代的也里可溫，考證明末清初的天主教歷史，也常向馬先生請教。但是馬先生常和上海徐家匯天主教堂書樓主任張漁珊神父通信，要求借閱各種聖經的原文本或譯本。他做過很多次大規模的演講，總是以聖經的道理為主；他發表過很多篇有關人心國事的重要文字，也無不以聖經的道理為中心。而以民國五年五月七日在北京中央公園演講「聖經與人羣之關係」，題目顯明，聽眾最多。演講稿有刊本，其中兩段我還保存先生的親筆稿。那時他已七十七歲。

全文長兩萬四千餘字。十一月十三日我在臺

大校慶紀念會上講「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」，準備的稿子是一萬多字，講了一個半小時；兩萬四千餘字，我想至少要三小時。

他先解釋「古新經」（即新舊約）、希臘文與拉丁文聖經以及英文譯本起於何時，然後他說聖經關係人羣的第一原因是：

「救世主非救一國一民，故聖經之關係，關係普世人羣，但關係我中國人羣、中國國家為尤甚。何以故？聖經為萬法之根原故。……」

我想或許因為聽眾中有許多是新教徒，而新教早有了新舊約全書，且很普遍，所以馬先生引用的是新教譯本。他說聖經之所以關係人羣的第二原因，是我國雖也知道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」，但聖經所說是真兄弟，因同為造物主所生、所養、所愛護。

然後他提出違背兄弟友愛的有四，實行兄弟友愛之道亦有四。他舉了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至二十六節；又三十八至四十八節；路加六章三十五節；馬太五章二十七至三十節。出埃及記（馬先生譯為「出走記」）二十章十四節；申命記五章二十一節；馬太七章一至五節；馬太十八章，馬太六章二十四至三十四節等等，亦即第五、六、七、八條的誡命。（新教列為第六、七、八、九條）。先生認為：「比羅馬法律更為周到；比孟子所說：『殺一無罪，非仁也，非其有而取之，非義也』，又分外充足。」演說的後半部先生又說：

「然而孟子已說：『能不殺不取，大人之事備矣』，

但不殺不取，不過是消極的，至救世主訓誨友愛之事，積極的又有四端。」

馬先生下面提出：

第一要恕道，見馬太七章十二節；路加六章三十一、三十五、三十八節。

第二要誠實，馬先生引馬太五章三十三至三十七節；六章十三節。

第三要謙恭，馬先生引馬太六章一至六，十六至十八節。

第四要知足，即知足安分。馬先生引馬太六章十九至二十三節。馬先生說：

「聽受福音的，每一分，每一秒，都要增積善行，藏之天國而不遺，蓋人生如草頭露，風中燭，那裏有空閒工夫，以世務為務，世樂為樂，世財為財，與人爭閒氣呢？聖經記宗徒爭高位，基督說：高位嗎？先該服事人。為此說，所爭者，其惟友愛。馬先生最後說：

「諸位看救世主，從馬太五章起，說到如今，辛辛苦苦，留下這篇聖訓，不是教人看看便能，是望人實踐躬行的啊！」

這篇「聖經與人羣之關係」的演講是有為而發的，因為那時全國的軍閥、土匪、政客……爭地、爭錢、爭權、爭利，所以馬先生在當時的首都，以他的地位很沉痛的做了這次很重要的演講，現在割地自雄的現象是沒有了，但其他你爭我奪的事，仍然到處都有。所以現在人仍然應該看看。我已收入「馬相伯先生文集」，文海書局重加影印。

五、「救世福音」的對譯

民國五年以後，先生數度往來上海、北京之間。各地的水災、匪災以及軍閥的內訌，日軍的侵略，都使先生悲憤異常；先生的救國主張是民治，即人民自治，又主張聯邦制。而民國七年，教廷與我國都已發表大使，卒因法國的反對，事敗垂成，先生感慨尤多。雷鳴遠、湯作霖（Antonius Cotta）二神父最愛中國、中國人和中國教會；但雷神父被逼離華，此後就是馬先生和英敏之先生照顧湯神父。先生薪水收入，多捐助震旦大學、輔仁社、北京培根學校、上海啓明女校等。我近年編撰「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」，竟因材料不足，而未為湯神父立傳，至今耿耿。

在馬先生的遺札中，很多件裏提到湯神父；最近承蒙溫順天神父（Peter J. Barry）在美國瑪利諾會（Maryknoll）替我搜到了一些資料，我想我不久要補寫一篇的。因湯神父於民國十一年加入該會，並前往美國，已去世。

但是民國五年以後，使他興奮的事也不少。民國九年他以八十一歲高齡親自翻譯了教宗本篤十五世的傳教通諭（Maximam Illud）「夫至大至聖之任務」。民國十年教宗代表剛恒毅（Celso Costantini）的來華；十三年第一次全國教務會議在上海舉行；十四年十月十日，公教大學（即日後之輔仁大學）國學專修科，又名輔仁社，正式開學；十八日上諭，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，第一批六位中國主教在羅馬的祝聖，其中朱開敏主教是他的外甥，都使他老人家歡欣無已。民國十年先生南下，即不再北上，常住於上海土山灣。

二十四年，先生九十六歲，在上海「聖教雜誌」發表「救世福音對譯序」。二十五年，他遷住南京，將譯稿付託于斌主教設法印行。

二十六年，他已九十八歲，國民政府先對他的熱心教育，明令褒揚，後又發表他為國府委員。是年三月十九日，于主教已簽名准印他的「對譯羅馬監本四聖史」。八一三滬戰既起，不久，南京危急，政府護送先生至桂林。

二十七年十月，我就是桂林風洞山拜見他老人家。我從十六歲讀到他第一篇文字即英敏之先生的「萬松野人言善錄」序，私下奉他為師，十三年後，我幸能在兵荒馬亂之中拜他為師，而且那地方離明末吾教先賢羅式相殉難處不遠。三十五年四月五日，我復員到了南京，第一晚就住天主堂圖書室中，堆滿了馬先生的遺書；我見到他親筆添改過的「馬氏宗譜」，在其他書中也夾有不少寶貴材料；六月我到北平，又在英敏之先生家中找到了馬先生很多的信、文章，我編成了「馬相伯先生文集」。三十六年三月，北平上智編譯館出版。可是一直到民國三十八年一月，也就是他逝世後十年，他的「福音經」纔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。他竟不能及身而見，而且版本型式也未能達成他的願望。「聖經辭典」說是一九三七年即民國二十六年出版，是錯的。

出版之後，發現以前所發表的序文和例言都不全。據自序，可知馬先生對譯的原則是「詞意明顯」，「語氣充足」；「只求貼切原文，不避生硬；然非見於古文者，亦不敢用，用亦祇取其平淺者，蓋對譯原為大眾故。」他舉「天主經」為例，原文並沒有「我等願」「我等望」，「及」字不翻（et in terra）。「但」字不翻「但」

」（Sed libera nos a malo），譯「乃」字。他的譯本有一特殊處，即「基督」譯為「基多」，以從辣丁音。

他的譯本頗多冷僻字，舉一例言之：若望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至十七節，耶穌兩次用 agnus，或譯為「小羊」，或譯為「羔羊」；第三次耶穌用 ovis，或只譯為「羊群」，或只用「羊」字，先生用「群羊」。「正字通」以為乃「群」之譌。「群」母羊也。他並不是故意愛用冷僻字，而是表示漢字豐富，足以翻譯任何古代西方文字，而能恰到好處。或謂馬先生說：他的聖經決不用耶穌以後的字。耶穌生於漢哀帝時代，以後中國新創之字，馬先生確未採用。出版後，不久大陸即告淪陷，所以現在已不多得。但是他老先生以九十歲以上的高齡，猶從事於翻譯福音，並且字斟句酌，絲毫不苟，實足為我們法效。

六、結語

我從小沒有念很多書，但從馬先生的著作中我學到了很多。我奉他為師，我自稱是他的私淑弟子。今天我作這次演講，也是為了對我的老師表示一番感激之心。我對他是終身難忘的。

「論語」記子貢曰：「君子之過也，如日月之食焉；過也人皆見之，更也人皆仰之。」馬先生壯年時，或許有氣盛之處，而當時教會的措施亦必有不合理之處，但馬先生晚年仍以恕道待人，為教會出力之多，亦非一般人所能及。近年教會中人入迷途者不少，迷而知返者有幾？對馬先生有愧色矣！

(附) 馬相伯先生簡譜

- 清道光二十年(一八四〇)三月初六日(陽曆四月七日)生。名良，聖名若瑟。
- 清咸豐元年(一八五二)十二歲，入上海徐滙公學。
- 四年(一八五四)十五歲，始讀拉丁文。
- 清同治元年(一八六二)二十三歲，耶穌會初學院成立，先生與李秋(字問漁)等十一人，同時入會。
- 四年(一八六五)二十六歲，攻讀哲學。
- 六年(一八六七)二十八歲，攻讀神學。
- 九年(一八七〇)三十一歲，晉司鐸。
- 十年(一八七一)三十二歲，至南京傳道，研究科學。
- 十一年(一八七二)三十三歲，任徐滙公學校長並教課。
- 十三年(一八七四)三十五歲，仍任徐滙中學校長，譯著「度數大全」。
- 清光緒元年(一八七五)三十六歲，研究天文學。
- 二年(一八七六)三十七歲，奉教會命調至南京，退出耶穌會，任山東藩司文案。
- 七年(一八八一)四十二歲，任駐日使館參贊，改任神戶領事。
- 八年(一八八二)四十三歲，李鴻章派赴高麗襄助推行新政。與弟建忠(字眉叔)平政變，執大院君歸。
- 十年(一八八四)四十五歲，李鴻章命調查各地招商局賬務。
- 十二年(一八八六)四十七歲，應劉銘傳請至臺灣，建議借款開發，未見採納。李鴻章派赴美洽商借款。繞道倫敦、巴黎、羅馬而返，曾晉見教宗良十三世。
- 二十一年(一八九五)五十六歲，受沈太夫人臨終勸言，重返教會，在佘山退省一年，由沈則寬神父講道。
- 二十二年(一八九六)五十七歲，梁啟超從先生昆仲習拉丁文。
- 二十四年(一八九八)五十九歲，梁啟超請清廷設譯學館，聘先生主持，因戊戌政變而中止。先生與弟合撰「馬氏文通」刊行，先生不署名，以獎勵其弟。
- 二十七年(一九〇一)六十二歲，譯「新史合編直講」，將四福音合而為一，正文用文言，直講用白話。
- 二十九年(一九〇三)六十四歲，蔡元培等二十四人，請先生教拉丁文，乃創設震旦學院，設語文、象數、格物、致知四學科，一切事務均由學生自治，且實行軍訓。
- 三十年(一九〇四)六十五歲，于右任來震旦肄業。
- 三十一年(一九〇五)六十六歲，學生不滿外籍教士，另設復旦大學，先生被推為校長。
- 三十三年(一九〇七)六十八歲，梁啟超成立政聞社，先生任總務員，並往日本演講，到處轟動。張之洞稱之為中國第一演說家。
- 民國元年(一九一二)七十三歲，與英敏之(華)上書教宗，請設一公教大學。(即日後之輔仁大學)十月十八日任代理北京大學校長兩個月又九日。
- 二年(一九一三)七十四歲，先生所譯「新史合編直講」在上海出版，未署名。與章炳麟、梁啟超發起「函夏考文苑」，即中央研究院前身，未成。
- 五年(一九一六)七十七歲，五月七日在北京中央公園演講「聖經與人羣之關係」。
- 八年(一九一九)八十歲，擬譯保祿書信。
- 九年(一九二〇)八十一歲，譯教宗本篤十五世傳教通諭(Maximum Illud)。
- 十六年(一九二七)八十八歲，與徐允希合譯「靈心小史」，即聖女小德蘭自傳。
- 二十四年(一九三五)九十六歲，發表「救世福音對譯序」。
- 二十五年(一九三六)九十七歲，遷往南京，以「福音」譯稿託于斌主教設法付印。
- 二十六年(一九三七)九十八歲，一月二十八日國民政府因先生熱心教育，明令褒揚。十四日任先生為國府委員。十一月，遷居桂林。
- 二十七年(一九三八)九十九歲，十月二十一日、二十二日兩次託方豪司鐸探詢所譯「福音」下落，並希望用線裝大型本刊印。十一月二十七日，先生遷至安南諒山。
- 二十八年(一九三九)一百歲，教宗頒賜祝福。三月十九日諒山寓所舉行百歲謝主彌撒。四月五日政府頒褒嘉令。十一月四日逝世。十八日政府頒令悼惜。
- 三十八年(一九四九)卒後十年，「福音經」(先生自題為「救世福音」)二冊出版。